

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的 文字资料：阅读与比较^{*}

陈明明

内容提要 历史学家还原历史,不过是试图在史料与史实之间拼接出合理的社会图景;政治学家解释历史,不过是试图在史料与史实之间建构起逻辑的理论关联。我们对历史的讨论总是要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展开的,我们对历史的观察和解释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史料。本文以政治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为例,对文字史料几个类别的特点、使用及注意事项、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做了讨论。

关键词 口述史 回忆录 日记书信 年谱 档案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18.01.007

当代中国政治史是兼备政治学与历史学双重视角的研究领域。作为具有浓厚历史叙事风格的一个研究类别,政治权力的解析自然不能自外于历史学的基本要素,政治结构与政治过程的阐释同样需要纳入其中加以妥善处理。这些基本要素就是时间、人物、事件和史料。

时间的重要性可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表达:“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①这句话表明,时间首先表现为人的生命物理过程(生命的尺度),没有时间就没有生命成长的见证,历史本身就是作为生命矢量的延展。然而时间又不是单纯的被动的生命物理过程,而是人的积极存在的形式,人的发展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时间的不同节点呈现出来的条件、关系对人的选择具有深刻的制约,但人的发展不仅受制于时间,本身也可对时

间施加影响,利用时间的不同节点呈现出来的条件、关系加速或延缓时间的社会节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时间才真正成为历史——时间不仅是生命的一维性物理运动形式,时间也包含着人类社会运动的多维结构的性质,后者体现了所谓的历史感,构成了历史得以被认识和理解的向度。

正因为时间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和人的发展的空间,作为时间的历史是以人为起点的,“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②这个“人”既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群体、集团、阶级的“人”,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现实的人”,即从事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的,具有动机和利益、认知和能动、交往和理性的,“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的社会的人。因此人的活动构成了色彩斑斓、丰富多样、无限复杂的世界,而政治则是这个人类世界最活跃、最机敏、最富于戏剧性的特

* 本文为2016年6月15日中山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从经验到理论:中国研究对政治科学和政治理论的贡献”高级研修班的演讲报告,刊出时略有修改补充。

质之一。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都看到了人之于政治的这一特性“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④以人为中心的时间和政治展示了人类社会大江东去、沧海桑田的史诗般的历史进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人是历史的主体和主题。毋庸赘言,政治史要研究人,要通过人的关系、人的交往、人的斗争来揭示权力、制度与国家兴衰演进的机制。

事件和人物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开始时可能仅仅是一个“事”,但这个“事”在特定时间内若获得了意义,即人及其行为“参与了历史进程”,就成为事件。某人喝口水噎死不是事件,但因某种原因不得不喝这口水而噎死就可能成为事件,因为虽是个体行为背后却可能有结构的强制(所谓“不得不”)。同理,某人喝口水噎死不是事件,但一群人喝水噎死就成为事件,因为一群人因喝水而死亡背后必有原因和意义。例如,台北妇人林江迈贩私烟被查缉不是事件,但由此酿成民众和警方对抗继而引发“二二八”暴乱就成为事件;孙志刚在广州因未办理暂住证被警察送往收容所乃至死于收容医院不是事件,但非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恶行引起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质疑,进而导致人们上书人大,要求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就成为事件。许多行为的发生也许出于偶然,但行为的起因、结果对某种“必然”进程产生影响多半就构成了事件。“文革”中群众组织破坏交通运输的事情很多,但1966年11月上海“工总司”在安亭卧轨抗议造成京沪线的中断无疑堪称大事件,因为它导致了最终控制上海政局近十年之久的一股组织力量的崛起,并把由该组织力量翌年发动的“一月革命”推向全国。当然,行为者的身份不同,能构成事件的条件也不同,中央文革小组大员王力被武汉“百万雄师”扣押(不过是一天)绝对是1967年震动中国政坛的大事件,但与此同时在武汉两派对抗中许多籍籍无名者的被迫害、被关押或被杀害,在历史的书写中也许就是若干个“事”而已。

相对于时间、人物和事件这三者而言,最值得重视的是第四个要素,即史料问题。离开史料,时间纯粹是一个物理刻度,人物只有抽象的脸谱意义,事件则沦为浮光掠影的一骑红尘。从19世纪开始,职业史家便普遍强调历史研究中的史料的重要性,尤其是新史料的优先性地位,主张“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⑤史料引导到哪里,研究者就走到哪里,所谓“大胆假设”,没有史料为基础,不过是凭空臆设,训练学生,总是强调先有史料,后有想法。

毫无疑问,史料不等于史实,但是历史研究若要揭示所谓历史真相和历史逻辑,就离不开史料。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叙事学认为,一切历史只能是被写下的历史,没有被写下来,是发生过的历史,但未必是能为我们所知的历史。换言之,史实是发生过而现在消失了的历史事实,正是因为消失了,“这事”是不是史实就存有争论,争论总是围绕着史料即存留下来的历史记录(包括实物资料)来进行的。没有记录(史料),极而言之,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就寸步难行;退而言之,我们对历史的叙述不过是主观想象。然而,即使有了记录(史料),我们对历史的把握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层累造成的历史”(顾颉刚语)或“层累造成的史料”不必多说,即使是我们经过的尚属温热的历史,因人们不同的心理体验、不同的成长历程、不同的价值偏好、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历史的书写和表达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结束离我们不过半个世纪或近半个世纪,经历过“文革”的人还在,在主流叙述和集体记忆中,“文革”是十年浩劫、社会动乱、百业凋敝、精神荒芜的黑暗年代,但高默波笔下的高家村,对农民来说却是黄金时代: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小学,实现了全部适龄儿童的入学;高家村的赤脚医生制度给农民提供了方便和廉价的就医条件,第一次有效地控制了血吸虫病,第一次大大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大幅度提高了人均寿命;高家村用本地的传统曲子和语言改造了样板戏,自己登台表演,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高家村农民第一次能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活动,第一次在民兵训练中使用真枪实弹,第一次不需要介绍人而自由地谈恋爱等等。^⑥高默波使用了大量的史料,还有观察、访谈,他的贡献

是打破了人们对历史的程式化的看法,在一般结论旁边提供了差异性的例证,但这些史料(假定是真实的准确的)能揭示“文革”期间农村社会生活的真相吗?或者局部的真实能等同于整体的真实吗?

这就是我们讨论史料的意义所在。所谓史料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文明发展的一切信息,或有助于人类认识自身历史、复原历史真实情况的一切资源,主要分为文字史料(包括口述)和实物史料。不论如何,我们对历史的讨论总是要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展开,历史学家试图还原历史,不过是试图在史料与史实之间拼接出合理的社会图景;政治学家试图解释历史,不过是试图在史料与史实之间建构起逻辑的理论关联。历史一经发生便是消失,我们对历史的观察和解释不得不完全依赖于史料,因此对史料的使用、鉴别和评估就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文字史料是最基本的史料载体,大体又可分为口述史、回忆录、日记书信、年谱和档案几种,对这些史料的阅读、使用、比较和分析,是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口述史

最早的历史是通过口耳相传,依靠声音,借助记诵而传承下来的。人类童年时期有许多经由口头传诵而产生的长篇叙事诗,如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中国少数民族史诗《江格尔》(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格萨尔》(藏族)等,大都是宫廷歌手、吟游诗人或民间艺人创作、加工和整理的作品,人们通过这些史诗来了解古代先民的社会生活、民族迁徙、部落战争、习俗制度。口传的历史未必是信史,在远古时期,历史和神话经常纠缠在一起,正如库朗热所说,古代的私有权利和制度是由宗教导出来的,城邦即教堂,城市如神庙,执政者就是祭司,所谓宇宙秩序体现为神祇-英雄-人的存在秩序。^⑦要把历史从神话中剥离出来,没有其他办法,我们不得不用心体察和鉴别口传,努力从口传中(借助想象和推理)“复原”出(实为拼接)初民社会的画面,把宇宙的法则翻译为历史的法则,把神的法则转化为人的法则。

则。

口传是口述历史的渊源,但和自然的口传不同,也和有意识的“采风”不同,口述历史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则是属于现代研究的部类和方法,这是因为由口传、“采风”变为口述史,是以现代化、专业化和规范化为基础的:首先,它把口述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目的的可供大众长期使用的口述历史档案来看待,即它的研究既不是出于官方历史文献采撷史料的需要,因而可能会自设藩篱,也不是出于个人研究的偶发冲动,缺乏长远系统的规划,而是试图建立口述历史专门档案以惠及公众和公共学术的自觉努力;其次,它把口述变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形式,有独立的历史信息渠道和独立的历史陈述形式,逐步建立起了独立的学科专业规范,这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录音、录像、电脑、通讯设备,使口述资料得以记录、保存和传播,从而避免了此前口碑史料调查的人工文字记录的主观性、随意性和不可查证性;第三,和本文可能没有直接关系但多被口述史学者强调的是,它主张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与人生经验都有记录的价值,都有历史信息及档案收藏的价值,让受访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让受访人成为口述史的主体,这种“人民性”和“开放性”被视为口述史界“最突出的革命性的贡献”,超越了对史料的收集本身,是对新历史观和新人类自我认知的探索。^⑧

口述史的实施过程与新闻访谈很相似,都是现场的问与答,都意图追求真相,都需要精心准备(做足功课),但二者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的旨趣是访史、存史、证史,是基于自觉的历史意识的学术工作,后者则更多地关心大众传播和受众的反应,不仅要事实,还要有新鲜感和轰动效应,故可能会对口述史做剪裁或加工,对口述的个人观点进行选择性地编辑,或将口述史的讲述变成旁白解说词,以至于歪曲口述史的实际信息内容。另一方面,口述史虽然出于访史、存史和证史的功能需求,但口述者多半不是学者,口述的方式和风格不会循规蹈矩。唐少杰认为,口述史有5个特点:(1)具体性,表现为口述者对特定事件或特定问题的鲜活讲述;(2)发散性,口述者本人的叙述常常是洋洋洒洒信马由缰;(3)追寻性,即回顾性的讲述;(4)差异性,口述者因能力、素质、意识和目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水平、内涵和个性;(5)选

择性,口述总是成为口述者主动选择或被动取舍的口述。^⑨这要求做口述访谈一要尊重口述者,二要事先做好“专案工作”,^⑩三要调控口述现场,例如适时插入具体问题,让不自觉扮演历史评论员的口述者回归自我。

近年政治史研究,如“文革”研究越来越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过去的回忆,由于人的记忆本身的生理、物理限制,很难做到完全准确反映历史真实,虽然受访者事先做了准备,但现场的互动、激励也会对记忆发生干扰,如果受访者另有特殊原因而有意为之(回避或矫饰),事情就会更复杂。傅光明给出的例子是很典型的:在调查老舍之死的口述中,他发现三个自称是老舍遗体的打捞者的叙述并不相同,“只有一个可能是真实的,或者三个都不真实,绝对不可能三个都真实,因为那样就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捞起三个老舍。”^⑪这种扑朔迷离的“罗生门现象”最令人困惑伤神。唐少杰对清华“文革”的口述史研究中也注意到,“文革”口述是对“文革”历史的一种选择和取舍,口述者在“讲”与“不讲”之间、在“大讲”与“小讲”之间、在“主讲”与“次讲”之间、在“多讲”与“少讲”之间,实际上完成了对“文革”历史的“再造”。^⑫它带来的结果是,研究者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思路和目标,把研究的重心从原本希望利用口述材料来恢复历史转移到探究口述者如何建构历史上来。因此,就存史和证史而言,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史,要重视口述材料,但不要轻信口述材料,在处理口述材料时,要引入其他材料如档案、方志等文献对其进行参证。

回忆录

回忆录是做政治史研究经常需要关注和使用的材料。回忆录和口述史都是建立在记忆基础上的回溯性的叙述,但和口述史的实施过程需要访者和受访者的互动、借助两者共同完成不同,回忆录是叙述者个人的作品(这里不涉及有组织的集体写作方式),叙述者写作时可能会征询他人意见,可能会经由他人记录成稿再行整理,可能会利用档案文献补充、修正和支持他的记忆,后面这一点使得回忆录比口述史似乎离信史要近一些(当然也可能因有时间考虑如何“完美”解释和表达而离信史更远)。总体而言,回忆录是个人用文

字记录下来的追记本人或和他有关的他人过去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的一种特殊文体。当代人写当代史,首推应是回忆录的写作。将亲身经历的过程,所见所闻的人事,所感所悟的情理,以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丰富我们集体记忆的极有意义的事情。从亲历者为后人存史的意义上说,回忆录具有文献的价值,尤其是可以弥补经验研究的不足。复旦政治学者桑玉成有一项关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化与规范运行研究涉及领导干部的选任问题:在众多的政治竞争者之中,若能观察到某一个竞争者如何获得最初的关键的提名,无疑有助于增进对中国政治运行奥秘的了解。在经验研究上,这个工作似乎可以通过访谈来进行,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事人未必会说,所以事实上很难获悉最初的提名是如何发生的。^⑬我们不得不把这个研究托付于历史——时过境迁之后(也许需要十年二十年),当事人有可能在他的回忆录里给出答案,就像我们在“文革”或80年代改革开放的政治人物的回忆文字里读到的那样,但这样一来,它在范式上就属于政治史的研究,而不是政治科学的研究了。

在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由于某些档案的不开放,由于某些事件涉及当事人的利益或评价而不宜公开,或某些事件出于事关政治安全的考虑而不能公布,亲历者的回忆录对于了解政治过程(政治决策的形成及其背后的斗争)或纠正某种成见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中人们越来越重视口述史和回忆录的原因。近十几年来,各种回忆录不断涌现,特别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的回忆录,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国家层面政治运行的研究需求,一定程度弥补了因档案、文献不足而造成的认知缺憾。例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的回忆录,军委办事组负责人、林彪事件当事人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穆欣、戚本禹的回忆录,上海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徐景贤的回忆录,上海革命委员会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的回忆录,江青机要秘书闫长贵的回忆录,前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的回忆录,前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的回忆录,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直至当代中国政治史中的一些参与者如湖南造反派领袖陈益南的回忆

录,武汉造反派领袖杨道远的回忆录,清华“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的回忆录,“文革”第一张大字报领衔作者聂元梓的回忆录等等。这些回忆录中,有些披露了不为人知的材料,有些叙述了人物事件变化的隐伏线索,有些给出了当时内部决策的前因后果,有些提供了重新认知和评价历史的某种角度。试举两例:

一例是朱永嘉关于文革前夜《海瑞罢官》批判重点转移缘由的说明。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一文,重点是落在指控《海瑞罢官》借“退田”而鼓吹“单干风”,认为该剧作反映了作者吴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这也是毛泽东和中央一线领导人当时的重大分歧之一,即是坚持集体化道路还是回到“包产到户”。吴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后不服,说他的《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而鼓吹“包产到户”的“单干风”是1962年出现的,1960年的作品怎么可能预见性地影射1962年出现的事?吴晗说“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谈历史?!”吴晗的反感和抗议反映在《光明日报》总编室1965年11月15日编印的《情况简编》第362期上。毛泽东看到了这期的《情况简编》。^⑭朱永嘉的回忆录提到姚文元文章的漏洞引起毛泽东的思虑:

毛泽东在看了反映吴晗讲话的《情况简编》后写下“一夜无眠”的批语。能使毛泽东睡不着觉的事一定是大事,因为《海瑞罢官》中的退田与包产到户的“单干风”联系不起来,时间逻辑上发生错误了,姚文元文章从政治上对吴晗的批判也就站不住脚了。所以毛泽东思考后才转而采纳了康生的说法,文章做到“罢官”问题上,提出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其实彭德怀并不是毛泽东此时的主要目标,这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⑮

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讲话,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并不陌生,但把《海瑞罢官》的性质从鼓吹“单干风”(这是姚文元文章的主旨)转为为彭德怀“罢官”鸣冤叫屈,竟然是为了合乎时间的逻辑,这个史料是“文革”研究中从来没有披

露过的,^⑯原因恐怕是没有几人知悉此情。由于朱永嘉的身份以及他与姚文元良好的私人关系,^⑰他的说法无疑是值得重视的。朱永嘉是“文革”时期上海写作组的组长,也是修史出身的历史学家,他的回忆录中提供了上海“文革”历史的许多细节,有些细节对于认识“文革”不是无关紧要的,而且表达了他对这个历史事件的理论思考,这些思考的深度在一般的历史亲历者中也是不多见的。

另一例是吴伟关于改革开放前期“物价闯关”决策及其引起内部不同反应的记述。1988年的“物价闯关”一般被认为是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轻率之举,此举导致了社会的抢购风,破坏了政治和社会稳定。尽管在邓小平文选中,邓说过:“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题,但这个关非闯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⑱但1988年最先提出“价格闯关”的不是赵紫阳,而是邓小平,赵紫阳的“闯关”决心是邓帮助他下的,这一点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机要秘书吴伟在他的回忆录里披露他求证此事的过程,并以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为据,指出“价格闯关”的最高决策者是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响应者和身体力行者,而党内元老陈云则对“价格闯关”持有不同意见,后者见诸1988年5月18日和28日政治局两位常委向陈云的汇报和陈云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的谈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篇文章指责中央主要负责人不听陈云意见,没有采纳陈云的提醒。^⑲问题是,陈云的声音根本没有在当时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和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传达过。赵紫阳的秘书李树桥对吴伟说他从未听过陈云对“物价闯关”表示过意见,他还就此事专门问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国家体改委常务副主任安志文,后者明确回答“没有听过传达”。陈云在党内是与邓小平并驾齐驱的人物,以他在经济工作的影响而论,他关于价格改革的意见无论如何都是要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传达的。那么,这两位政治局常委为什么不向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传达陈云的意见呢?吴伟的回忆录说,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不方便传达:

在80年代的中共党内,高层在一些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

问题上, 陈云主张“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 邓小平则支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主张。后来随着后者在党内影响日重, 前者就基本上不再讲话了。十三届一中全会上的那个决议, 使邓小平成了党的“最终决策人”, 中央常委只有“一个婆婆”, 党内已经几乎没有任何人敢于挑战这个权威。××和×××(政治局两位常委) 都很清楚, “物价闯关”是邓小平要××向政治局传达并极力主张的。在这个涉及到党内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候, 如果他们没事找事地去汇报, 并在中央常委和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反对意见, 那就等于直接挑战最高权威。这对于××和×××说来, 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做的。或许他们对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不满, 或许他们认为“闯关”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建议的, 或许他们从内心里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早有不同意见, 但要他们直接向最高权威挑战, 那是打死也不敢的。^①

我为什么注意到吴伟回忆录的这一段叙述呢? 第一是因为它有趣, 它生动地表明党国高层精英的行事动机和普通人其实无异, 都服从成本收益比较的理性人选择, 试想在“两个婆婆”的情况下(虽然后来只有一个婆婆), 聪明的媳妇不会轻易得罪其中哪一个, 政治的平衡和规避同生活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做政治分析不用把政治神秘化, 只要还原为常识, 就可体会出政治其中三味。第二是因为它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老人政治现象, 老一辈革命家的权威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不可或缺的资源, 革命老人的存在保证了现代化转型的平稳过渡, 但也给中生代领导的自主选择构成了强大的约束, 老人政治的影响存续到新世纪, 才逐渐消退。80 年代的改革开放是党内与党外、上层与下层、元老与“壮丁”互动平衡的过程, 这个过程有许多经验可以总结。第三是因为“价格闯关”这个曾牵涉千家万户利益的大事, 虽然代表了中国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和改革者的勇气, 但在要素市场极不成熟的情况下, 在缺乏足够动员和准备的情况下, 其政策出台如此“冒进”, 反映了执政高层团队对中国改革复杂性和艰巨性缺乏深入的认识, 缺乏“顶层设计”, 这种“闯关”既是过去革命思维的毕其功于一役的产物, 也是

决策未能践行科学化民主化的结果——尽管 1986 年, 即两年前万里已代表中央对此发表过重要讲话。^② 总之, “价格闯关”的失败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案例, 其台前幕后隐藏着极为丰富的信息, 如果离开当事人的回忆和叙述, 我们就无法看到历史的多样性。

人们的个体回忆都是不可避免地有着记忆上的误差, 如果仅仅使用一部回忆录, 就可能发生问题, 失之于片面, 但使用多部回忆录, 并详加参证, 就相当无影灯, 降低缺陷率。这就需要鼓励历史的亲历者共同来回忆, 在开放的多元环境中, 不同的人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可以彼此互证, 彼此修正误差而趋于客观、公正。以上所引的朱永嘉和吴伟的回忆文字同样也应放在这个开放的多元环境中来阅读。正如王海光所言, 在存史的问题上, 我们不能期望每个人的回忆都是客观、公正和准确的。实际上人们记忆上有意无意地疏漏、讹误, 是回忆录中非常普遍的事情。但是, 只要大家都能参与到存史过程中去, 个体记忆上的错讹就会最大可能地得到矫正。^③

日记书信

如上所述, 回忆录不可避免地有着记忆上的局限, 即使是使用多部回忆录, 面对已经消失的历史, 特别是消失多年的历史, 回忆与史实之间也仍有可能发生误差。较之回忆录, 人们当时留下的文字——如日记和书信——可能比日后的追述更接近历史, 换言之, 日记书信的可靠性程度要高于回忆录。以下是一本教科书上引用过的关于回忆录和日记比较的很好的例子:^④ 胡适的学生罗尔纲 90 年代写《胡适琐记》, 其中有一节写他随胡适“由沪迁平”, 即胡适由上海迁移北京的情景:

我跟胡适行入车站, 走上月台。满以为胡适广交游, 徽州亲戚也不少, 今天月台一定站满亲朋来送行的。谁知半个影子都没有。为什么亲朋满上海的胡适今天一个人都不来送行呢? 我心里才嘀咕着。已经走到头等车厢, 胡适看着他两个儿子和胡师母上了车, 正踏上车梯, 我忽然听到对面那边月台上有人大叫“胡校长! 胡校长!”我和胡适都掉转头来望。只见一个中国公学同学边跑来说“学生会派我来作代表送行, 请胡校长等

一等,要照个相。”原来那位同学在车厢对面那边月台上远远躲着,等候胡适到来,见胡适踏上车梯才喊叫,他跑近了,匆匆把照相机对着胡适拍了照,就立刻飞魂落魄地跑出月台。这时我才明白到今天是怎么一个场合!^④

《胡适琐记》无疑属于回忆录,叙述的是1931年11月28日胡适一家离开上海的事情。罗尔纲认为所以无人相送,是因为“人们认为特务会在车站狙击胡适”,所以才有学生在对面月台“远远躲着”等候胡适,匆匆拍照后“立刻飞魂落魄跑出月台”一说。

但是,胡适当天的日记却这样写道:

今天七点起床,八点全家出发,九点后开车。到车站送别者,有梦旦、拔可、小芳、梦邹、原放、乃刚、新六夫妇、孟录、洪开……等几十人。在上海住了三年半(1927年5月17日回国住此),今始北行。此三年半之中,我的生活自成一个片段,不算是草草过去的。此时离去,最舍不得此地的一些朋友,很有惜别之意。^⑤

罗尔纲是60年后的回忆,胡适是60年前当天的记录,我们应该相信谁?显然,我们应该相信胡适,因为他留下的是当时的记载。除非我们发现了另外的史料,比如,假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档案显示,徐新六夫妇、梦旦、拔可、原放等人两天前被拘捕,此时仍在接受调查——这当然是没有的事——我们才能怀疑胡适当天记载的虚假性。史实与史料之间永远存在距离,在这个意义上,还原史实是不可能的,但有些史料,譬如日记是距离史实最近的,只要记录者是写给自己看的。宋教仁日记中写他和日本女子西村千代子的暧昧关系;青年郁达夫日记中写他逛杭州钱塘江畔妓院对男女之事的格外留意;^⑥蒋介石日记中写他年轻时对女性的迷恋(“见艳心动”)复又自责(“记大过一次”)的心理活动,^⑦都很坦率。这些日记的可靠性程度所以被认为很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记文体的私密性与即时性,写作时并没有公诸于众的意图,所录的是当日所见所闻所思,较少顾忌,故能够暴露作者的内心活动和隐私。反过来,如果作者写日记时存了一份发表之心,表白之心,其日记的可靠性就需要斟酌评估了。同样一个胡适,有人认为他是把日记当作著作来写

的,其留学日记不但重视内容,而且重视形式,到一定时候装订成册,题写封面。^⑧其实,胡适的问题是他成名早,他可能很早就有了名人意识,知道他的思想和生活会成为日后他人研究的对象,他落笔应该是有所考虑的。所以我们读名人的日记,不能不注意日记中的隐晦、代号、忽略、另种记述等问题,这也是使用日记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于政治人物而言,其日记的简略、省略,甚至不记,就不仅仅是考虑个人名声的问题了。如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日记,被认为对研究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政治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在重大政治问题、敏感人事,或涉及对重要人物的看法方面,他的日记通常会回避或较少着墨(如1954年2月17日高岗第一次自杀那天的记录寥寥数语,自杀二字还用俄文指代)。考虑到杨位居中枢机要,他的日记中对许多重大事情不置一词或一笔带过,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了。但《杨尚昆日记》仍然留下许多值得细细咀嚼堪玩味的线索或记录。人们都知道“文革”前夕的“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发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重大分歧,这个分歧给中国政局的发展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杨尚昆参加了1964年12月15日召开的研究“四清”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从12月下旬到1965年1月初),毛泽东多次指责刘少奇,并主持通过了包含批评刘少奇内容的重要文件《二十三条》。^⑨杨尚昆在日记中,没有写明毛对刘的批评,但从所记录的毛的话来看,他是清楚毛的锋芒所指的“我党至少有两派:社会主义派和资本主义派”“自以为是,就是形而上学!自以为是,而不是自以为不是”“北京就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1964年12月27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压迫着我们,要搞掉我们”“文件行不行,第一条性质的规定行不行?三种提法好不好?商量过还是以第三种提法为好。因为运动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不是前两种的运动!”“请看看党章(八大文件)和宪法第三章,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12月28日)“人不要多,文件不要太多,开会不能太长”“总之要依靠群众,不能依靠工作队!”(1965年1月4日)^⑩毫无疑问,毛、刘关于社会矛盾性质、运动方式、指导思想的争论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如记毛的话多用惊叹号)。在1965年1月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是比较明白了,但还不是全都明白了!还得再听听,看看。总之问题是较大的,不只是方法问题。”在1月14日的日记中,又写道“现在要注意:刘话不灵了,不蹲点了!”^⑳他看出了在过去几年国民经济调整中自称为“非常时期大总统”^㉑的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刘少奇的地位此时发生了动摇。这些文字是观察和理解“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共产党党内高层斗争和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变的珍贵材料。

至于书信,则是和日记同等重要的原始史料。“书札属于第一手材料,因为它多为作者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常有旁人不知的内幕情形、机密消息,而且一般说来没有什么忌讳,比较可靠。”^㉒例如郭沫若,批评者认为其新中国成立后地位很高,紧跟形势,迎合主流,常常不能做到言为心声。“大跃进”时郭沫若和周扬采集民歌,编《红旗歌谣》,世人皆以为郭对大跃进运动的拥护发自内心(开始可能如此),一以贯之(后来却未必)。然而,1963年11月14日他给陈明远的信中所写的话,在郭公开的文字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来信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和你有同感。大跃进运动中,处处“放卫星”“发喜报”、搞“献礼”,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浮夸虚假的歪风邪气,泛滥成灾。……“上有好之,下必甚焉”。不仅可笑,而且可厌!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㉓

书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反映一个特定时代或时期的物理或精神面貌,政治名人的书信往往涉及某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或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普罗大众的书信也能从某个侧面折射出被政治或军事活动卷入其中的生活世界和思想情感,因而具有史料价值。复旦大学张乐天教授工作坊近年搜集了不少五六十年代的书信、日记、笔记,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普通人在这个生活世界的悲欢离合。例如“潘政亚组信件”,是潘政亚、政荣、政健、政福、美丽等兄弟姐

妹之间的通信,以及潘政亚给父母的信,其中政亚于1950年代末从劳改农场写来的信表明1959年大饥荒已经开始发生,信中关于饥饿的描述和感觉令人震撼。“杨志明组信件”可以反映1950年代上海郊区农村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其中一封值得关注,1960年一个外出逃荒的战友从江西南昌写来,讲到了逃荒的苦难,请志明“把破的被子寄来”,困窘至此,非个别现象。“吴坚毅组信件”是她和学生、战友、子女与亲戚的通信,内容庞杂,时间段从1950年代一直到2000年初,共有437封,其中第二组(203封)主要是写给子女和学生的,写信的年份包含1950年代与1960年代。这组信对于理解那个年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主体性、自我观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㉔

书信的重要性还在于它能提供证明。以施蛰存与苏雪林^㉕对同一件往事的不同说法(他们是否见过面)为例。施蛰存《善秉仁的〈提要〉》一文说,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住在文化广场旁边暨南大学教师宿舍,苏雪林去看过他。而苏雪林在复施蛰存的信称“我仅于先生办《现代》时见过一二面,暨南大学在上海何处一毫不知,当无过往之事。”苏这封信写于1985年2月4日,载《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据台湾成功大学印行的《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这年2月1日,苏雪林接到香港古剑的信,信中附了施蛰存文章的复印件,读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文中所言余离开大陆前曾赴暨南大学看他,送她(他?引者)善秉仁著一千五百小说与戏剧,则完全虚构。”(第十二册,240页)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抗战胜利后施、苏二人未曾谋面即是定论。

因此有人引用了这段材料慨叹“这个令人摊手的例证所告诉我们的,史料本身也是一柄双刃剑。有很多事情,除了罗列各种说法,我们已无从判断孰真孰假,孰是孰非。”^㉖

然而,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无从判断说”有了判断——郑芬在2014年3月2日的《东方早报》上认为施蛰存说抗战胜利后他见过苏雪林并非如后者所言“完全虚构”,出示的证据恰恰是苏雪林早年(1948年2月)写给施蛰存的一封信(影印件)。郑芬说“成功大学印行的苏雪林日记是从1948年10月1日开始,此前或未记,或已遗失,无从证明抗战后施蛰存与苏雪林是否见过面。

而我手头正好有一通苏雪林写给施蛰存的信,全文如下(原文无标点):

蛰存先生大鉴敬启者:前日承惠临赐教,至为感谢!林子昨日上午及下午凡到辣斐德路两次,在辣斐影戏院上下寻访良久,始终未见二九五号高级机械学校,以电话询问又不能通达,只有怅怅而罢。林平生于觅路一端,低能出人意表,但咫尺蓬山,不能得其门而入,则尚为第一次经验。先生闻之当亦莞尔。明日六时即乘机返鄂,未能面辞,尚乞原宥。以后尚望多赐玉音为感。敬颂

文祺!

苏雪林上,二月廿七日

(信的左下方有施蛰存标明“1948”笔迹)

郑芬说“由此信可知,1948年2月下旬,苏雪林在上海与施蛰存见过一面(“前日承惠临赐教”——引者注),是施蛰存去访问苏雪林;苏雪林第二天去辣斐德路(也就是施蛰存文中说的文化广场旁边)回访,却因找不到地址而作罢。施蛰存的回忆只是细节有出入,绝不是苏雪林说的‘完全虚构’。上了年纪,对早年的事,说有说无,都不能太绝对。”^{③⑧}

这就是书信的功用和魅力——或解惑,或释疑,或去讹,或证伪。

年 谱

年谱是一种特殊的编年体的人物传记,年谱以谱主一人为对象,按照从生到死的时间顺序排列其言行、活动、经历,全面记述其一生的事迹。年谱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和口述的自由放开相比,年谱的记载是节制的;和回忆录的叙述相比,年谱的记录是经过勘核的;和传记作品对资料取舍的预定性相比,年谱的资料收录是较少限制的;和日记书信的主观个性相比,年谱的内容是讲究客观的;和编年史的广阔背景相比,年谱反映的历史进程是精细的。好的年谱并不仅仅是评价该历史人物其人其事的依据,而且是研究该历史人物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历史的宝贵材料。在史料学中,年谱的价值在于它的原始性、丰富性、可靠性和全面性。^{③⑨}年谱的编撰有自订和他撰两种形式,自订年谱多以日记为据,与日记相辅相成,但

自订年谱不可能写完一生,余下的岁月和事情还得有劳他人。他撰的年谱有他人为谱主编撰,或是门生故吏,或是研究者,除了利用日记书信,还有谱主留下的文稿、函电、批牍、会议记录等其他文件材料。

对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而言,中共人物的年谱无疑是最重要的史料。例如,《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朱德年谱》《陈云年谱》《邓小平年谱》《彭德怀年谱》《彭真年谱》《杨成武年谱》等等。按《毛泽东年谱》的参撰者张素华的说法,毛年谱的编撰要做到“两统一六要点”,即资料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系统性、完整性和可读性的统一。^{④⑩}其中“六要点”是:

(1) 资料性。资料性要求把材料找全,重要思想和重大活动不能遗漏。其中包括档案资料、访谈资料、记载谱主活动的书籍、重要人物和与谱主有交往人物的传记年谱等。(2) 权威性。权威性要求以档案为先,谱主讲话的录音稿和速记稿,权威部门记载谱主出行的材料。(3) 学术性。对谱主的思想、理论、决策和活动采取研究的态度,根据材料进行梳理、比较和分析,关注学界对谱主和谱主参与历史过程的最新研究成果。(4) 系统性。按年月日全面、具体、翔实地记载谱主的思想历程的系统性,包括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说、所做、所为,小到谱主的读书游泳,大到谱主的开会决策。(5) 完整性。对重要事件和谱主的重大决策注意首尾的相互衔接、相互照应,使读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全面的了解。(6) 可读性。兼顾谱主的语言风格,照录谱主的谈话,使年谱既有丰富史料,也生动活泼,好读好看。^{④⑪}总之,年谱既是谱主的起居录,也是谱主的思想史,既是个人的生平传记,也是社会政治的大事年表。

读年谱既可使我们对既有结论保持足够的存疑意识,从而避免简单化和片面性,也可使我们对某些问题有所反思,为评估某项政策提供权威的依据。以张素华所举的《周恩来年谱》和《毛泽东年谱》为例。在《周恩来年谱》1975年4月27日的记载中,有一段关于中央政治局开会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以反经验主义为名进行宗派活动的文字,《周恩来年谱》说“会后,王洪文以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为由,致信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

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12月会议的案。”^⑫在编写《毛泽东年谱》时,编撰者发现王洪文1975年5月1日给毛泽东的这封信并无以上内容,也没有点周、叶、邓的名字。王的信是这样说的:

在讨论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如,对前阶段宣传报道中以及有同志在讲话中提到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问题,有同志提出现在来引用主席五九年写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要修改九大、十大政治报告中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提法。有的同志对七三年十一月批评总理的错误时有同志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对不经政治局送给一些单位学习参考材料问题,对政治局不议大事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意见。由于出现了以上情况,将会议暂停下来。对这些问题如何处理,我曾分别找总理、剑英、小平、春桥同志商量过。在商量过程中,有同志对搞“四人帮”问题、批林批孔走后门等问题又提出了批评。在商量时虽然大家都同意还是遵照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精神把会议开好,迅速地将主席指示贯彻下去。但我仍然有些忧虑,希望能得到主席指示。^⑬

从信中可以看出,这是一封汇报请示的信件,语气和缓平实,不是什么“告状信”。信上有毛泽东圈阅的笔迹,表明毛泽东看过此信。但是,编撰《周恩来年谱》的人员坚持认为上面所引的指责周、叶、邓的信确实有,毛在信上既没有批示,也没有圈阅,估计是没有看到。他们推论,王洪文写的这封信没有立即给毛泽东,而是先拿去征求张春桥等的意见,他们觉得这样写太露骨,搞得不好,会像1974年12月长沙告状那样适得其反,因此王洪文重写一封,于是就有了5月1日的信。^⑭这就引出两个问题:第一,正如张素华所说,毛既然没有看到此信,自然某些著述说“王洪文的那番话,正说中了毛的心病,毛看后对周、邓二人疑心大起,但是毛泽东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权谋的老手,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⑮就缺乏史料依据。在逻辑上,毛坚持“文革”路线,他不会站在对“文革”采取纠偏态度的周、邓一边;但在证据上,没

有根据说毛对周、邓大起疑心。逻辑的真实不等于事实的真实。第二,说王洪文的第一封信“确实有”,只是怕弄巧成拙而重写第二封信,则为什么毛年谱的编撰者看不到第一封信呢?他们是完全有条件查阅档案的,如果第一封信存在,没有理由看不到,除非第一封信早已被销毁,如此一来,这种属于机密的“诬告”内容又是如何获知的呢?张素华说是年谱编撰者的“推论”,可见“诬告说”并非出自王洪文的供词。《毛泽东年谱(1949-1976)》至少在2002年已经开始动工编撰,^⑯其时王已病故(1992年8月3日),但张春桥还在人世(张死于2005年4月21日),他们完全有条件当面询问张(当然,张是否愿意合作是另外一回事)。因此“确实有”的说法就显得不无勉强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王的第一封信存在,那么说“四人帮”“诬告”周恩来,或者试图借毛之手整肃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也许符合逻辑的真实,但在事实的真实上,无疑是有瑕疵的。

张素华举的另一个例子可能是政治学者感兴趣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巨型政党,近些年来政党研究者已经指出这个巨型政党在党员发展问题上追求规模经济,但事实上落入规模不经济的陷阱,政党规模的不断膨胀和政党组织能力的衰减构成了一个悖论。执政党究竟以多少党员人数为适宜,是一个政党的适度规模问题。《毛泽东年谱》对于人们了解毛泽东对执政党党员数量的态度提供了一个窗口。这一点记录在通常可能被人们忽略的年谱的注释上。在介绍196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情况时,年谱编撰者把邓小平在同年12月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政治局常委会意见的内容放在注释中。邓说“组织工作会议的问题,常委都赞成书记处意见,重新登记党员。明年试点,后年全面登记。全面登记就是全面教育,要搞得严一些。主席说,程潜提出1700万党员是否多了?主席很欣赏,执政党党员多了管不了。一是清洗一批,一是搞共产主义小组,再是吸收一批。”^⑰

1962年,中国的人口约6亿多,党员1700万,占总人口2.83%,民主人士程潜认为多了,毛也如此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口13亿多,党员8900万,占总人口6.85%,远超过1962年的比率

(这两个数字是以总人口为基数的,如果以总人口中的成年人口为基数,这个比率还要大些)。“执政党党员多了管不了”,这话的意思应该是一个巨型的政党,遑论管理国家,即便是管理自身,也是非常不易。对中国来说,执政党建设其实存在两个思路,一是选举型政党模式,如此党员数量不必控制,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选战动员其实是人海战术。一个是先锋队型政党模式,如此党员数量求精不求多,贤能精英集团,以一当十,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毛欣赏的显然是列宁主义式的先锋队政党类型。当年的党员全面登记事实上没有在全国铺开,但“全面教育搞得严一些”是以“五反”“四清”运动的方式来进行。今天习近平的从严治党,也在开展“全面教育”,它会不会采取毛、邓当年想实行而没有实行的“全面登记”的方式来进行,人们可以拭目以待。历史有内在的逻辑,如果把毛作为正题,邓作为反题,习似乎在做的正是合题,理解习近平的治国理政和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历史是可以提供启示的。

总之,从政治人物年谱中去查找相关资料,从政治人物年谱中去解读历史,对于厘清以党史、国史为主线的当代中国政治史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认识中国党治国家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互动和内在紧张,以及为解决这种内在紧张而发起的组织和制度创新,都是不可缺少的。

档 案

所谓档案,简单说就是归档保存而具有卷宗形式的文书资料,未归档保存而直接公布的文书资料则称文件或文献。这有点类似“Law”与“Act”的区别,Act是国会议决的法案,它需要经国家元首签署并公布后才成为Law,但它的法律性是不言而喻的,只是少了个程序而未进入正式的法典而已。广义地说,来源清晰、留存下来的文件或文献都可以看作是档案,这是从强调这些文件或文献的原始性来说的。年谱所以受到普遍的重视,主要来自它的档案资源和档案依据。在《毛泽东传》里,毛讲过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说在他之后如果不能和平达成政权转移,则可能在“血雨腥风”中交班,这段话多被引用,似乎成为不疑之论。^④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段话没有第一手权威材料,不过要否认它也缺乏足够的根

据。《毛泽东年谱》根据叶剑英的讲述,在编写中引用了“两件大事”的话,但将“血雨腥风”移入注释中,说明年谱对档案的尊重和依赖。^⑤另一方面,即使有档案依据,但年谱的编撰者对谱主何事、何话可以录入,何事、何话不可以录入,或录入是简录还是详录,受制于特定的环境和政治考量,则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此外,年谱的编撰者是根据史料来编写年谱的,由于史料的不全,征史的偏差,年谱也会发生错讹。如《彭德怀年谱》记载长征途中彭德怀会见张国焘一事的时间、地点的偏差,《杨成武年谱》对出任“文革”时期中央专案组三办主任的一些记载的忽略,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因此,在最终的意义上说,裁决史实真伪正误的史料还得靠档案。

金大陆教授以“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是否凭票证供应猪肉为例,指出档案、方志材料对于厘清成说、辨别史实的重要性。在人们的记忆中,计划经济时代就是票证时代,“文革”期间更是如此。2008年8月7日,在“知青运动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会上,金大陆向与会者提出上海“文革”时期猪肉无需凭票供应的问题,当场遭到大多数“过来人”的质疑和反驳。作家叶辛以“在贵州农村曾十一个月没吃肉,回家路经弄堂时间闻到肉香,馋得向母亲提出要吃肉,却因肉票限制不能如愿”的记忆和家藏《票证大全》中有印着一头猪式样的票据为证,声明绝对不认同此说。高博特公司总经理张刚则当场打电话求证于原三角地菜场负责人,回话同样肯定了“文革”期间使用肉票的“事实”。但金大陆提供的档案和方志记载表明,上海自1955年至1992年的37年间,共五次采取凭票证供应猪肉的办法:第一、二次发生在“文革”爆发之前,第三次发生在“文革”临近结束的两个多月前,第四、五次则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档案和方志显示,在第二次与第三次的间隔期,也就是“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猪肉敞开供应为时达十二年两个半月”。他的结论是:广泛传播的上海“文革”时期猪肉凭票证供应之说,“是舛讹失真的集体记忆”。^⑥这并不是为“文革”唱颂歌,而是对历史的尊重。

另一个例子是辛逸教授对荷兰学者冯客(Frank Dikotter)关于毛泽东对饿死人不屑一顾说法的质疑。冯客是香港大学历史学教授,写了一

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书中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最大的暴君。立论之一是毛泽东早就知道饿死人的事,但仍在所不惜。在1959年4月召开的上海会议上,竟然说饿死一半人也没有关系。辛逸评论说:

这次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座几十人都有会议记录,分散在各个省的档案馆里。冯客本人跟我讲,他只去省档案馆,其余哪儿都不去,因为省档案馆存有大量的中央文件,而我们现在去中央档案馆是不可能的。他在兰州甘肃档案馆看到了张仲良(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会议记录,但是我们还可以在上海档案馆看到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记录,可以在山东档案馆看到舒同(时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记录。对这种事应该互证,但他没有,他只有孤案,然后他就开始议论,说毛泽东太坏了如何如何。但是我们查看上下文却是这样说的:陈云说,我们这1500个在建项目能不能减一半,至少减1/3,毛泽东说干脆减一半,不减1/3,饿死一半也没关系。毛泽东这里讲的是资金、原材料,在这么大的会议上,毛泽东怎么敢讲这样的话,说饿死一半人也没关系?我不知道冯教授怎么就弄出这么个东西来,而且成为这本书立论的一个核心材料。^①

张素华在《毛泽东年谱》里所用的档案材料也表明,毛泽东发现中国农村爆发严重饥荒的时间最早应是1960年10月间,而不是冯客所说的1959年4月,是由发现山东问题而开始高度重视起来的。张素华说:

1960年10月17日,因山东发现严重饥荒,毛泽东找曾希圣谈话,要他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尽快解决山东问题。……10月23日凌晨2点半紧急指示华北、中南各省区党委第一书记来北京开会讨论农业问题。当天晚上会议正式开始,陈正人汇报了山东的严重情况等。25日零时10分,毛又同刘少奇、周恩来、陶铸谈河南问题。这表明河南问题被揭开。所以凌晨2时毛泽东又紧急指示,派飞机接东北、西北、西南(无西藏)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来北京参加讨论农业问题的会议。26日,看到李富春报送的河南信阳大

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后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在这期间,他布置起草中央紧急指示,清楚陈述中央的农村政策,坚决制止“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接下来是纠正“左”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这便是第二次纠“左”工作的开始。《年谱》提供的新信息(指档案材料)表明,毛泽东最晚在10月23日凌晨已经知晓中国农村爆发严重饥荒的问题,甚至将这一时间提前到10月17日,请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可以的。^②

毛无疑对60年代的大饥荒负有重大责任,因为大饥荒主要不是“天灾”所致,而是“人祸”——乌托邦式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所致,^③毛是这一政策的始作俑者。但是,错误政策的盲目推行是一回事,视人命为草芥的心理动机是另一回事,如要在二者间建立关联,没有关系,请拿档案材料来说话。

前面说过,档案是历史上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党务等领域情况和人物活动的原始记录,是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档案的保存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工作。档案收藏的使命在于存史,存史的目的旨在知史和用史。但目前囿于各种原因,对档案的利用还存在不少限制。这对于研究者是憾事。但更令人遗憾的是,有些档案资料被销毁,直接违背了存史的基本伦理(敬畏历史,尊重历史)。^④例如1973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会议记录。^⑤这个事高文谦的书和刘武生的书都提到,高说批周的原始记录“全部销毁”,刘说“中央档案部门没有保存”。徐景贤在他的回忆录中透露,2006年10月16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耿飏女儿耿弘陪同下来徐家访徐,赵向他证实了此事,销毁发生在80年代初,是在邓颖超监督下由赵炜等人亲手完成的。^⑥为什么要销毁会议记录?徐景贤对此有说法,概括起来是三条:为毛泽东隐,因为是毛发起了批周会议并为之定调;为华国锋隐,因为华参加了批周发言,彼时他已成为“英明领袖”;为邓小平隐,因为邓也奉命批周,虽寥寥数语,却有诛心之论,且邓的地位和声望日隆。我个人宁愿相信,这主要是出于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缺乏现代档案意识造成的。我们的先辈固然有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贤

者讳的传统,但大都以为“平反”(祛诬正名或拨乱反正)的彻底程度是需要将“黑材料”付诸一炬来证明的,如此方得一了百了的安心,“文革”中多有为平反者从档案中抽出“黑材料”当面烧毁之举,以示恢复和保全完好之身名,“文革”结束初期亦如此。这种心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今天虽然不会再有销毁档案这种幼稚做法,但封存档案,不得利用,虽已过了《档案法》规定的时效仍不得开放,实际上不过是这种心态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最后,还需要说一句,即使是档案,它仍然是史料而非史实本身,对档案也是需要相互参证方能逼近史实的。档案上有的未必就是真实的,且不说有些档案,包括官方文件,由于各种利害关系未必说真话。在科技发达的情况下,档案的造假并非难事。例如我们每年六七月拍毕业照,校门是必不可少的背景,不幸今天大雨如注,我们不得不退居美研中心大厅合影,心有戚戚焉,拍摄者说没有关系,校门我给你PS上去,包你满意。这张照片可能留存于校档案馆或校史馆成为影像资料(实物史料),多少年后被做学科史或校史的研究者翻出来,说某某届毕业生毕业合影,是日天气晴好,门楣上“复旦大学”四字熠熠生辉,众学子聚集一堂,笑靥灿烂,依依惜别,如此等等。有当事者回忆,当日并非如此,研究者说我有档案为证,你是信还是不信?所以说,档案重要,但非唯一,历史研究,考证的工作总是要做的。☹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页。
-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74页。
-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
-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第21页。
- ⑤李隆国《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 ⑥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 ⑦库朗热《古代城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7-214页。
- ⑧见陈墨《口述历史门径》,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5页。
- ⑨⑩唐少杰《“文革”历史研究中的档案、记忆与口述的关系问题刍议》,载杨凤城《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77、77-78页。

- ⑩口述史学家唐德刚受命为张学良做口述传记,第一件事便是去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把该馆所藏有关张氏早年的书籍、档案、新闻纪录和单篇文章,编了个参考书目,再根据其中要件仔细清查”。见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 ⑪傅光明《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98页。
- ⑫桑玉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化与规范运行研究》(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在着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党内领导干部的最初提名权及其实际行使过程的兴趣,但也不无失望地承认在经验研究方面存在着似乎不可逾越的障碍。
- ⑬《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1页。
- ⑭朱永嘉《巴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史实的回忆》,大风出版社,2014年,第23-24页。
- ⑮直到2013年《毛泽东年谱》第5卷出版,大多数人才知道毛关于《海瑞罢官》“要害”一说和吴晗的辩证存在着如此的关联。朱永嘉应该在“文革”当时便已了解此中内情。
- ⑯见朱永嘉在复旦大学“中国社会政治分析”博士生课程上与学生的对话《文化大革命的遗产》(2012年12月10日)、《文化大革命:时代、体制与乌托邦》(2015年10月27日),载复旦大学陈树渠比较政治发展研究中心《比较政治发展学术月刊》第27期(非正式出版物)。
- ⑰邓小平《抓住时机,推进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1页。
- 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8年物价闯关前后》,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 ⑲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374页。以上所引文字有删节和变动。
- ⑳万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6年8月15日。
- ㉑王海光《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 ㉒见严昌洪《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第六讲“书札和日记类史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4-135页。
- ㉓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98-99页。
- ㉔胡适《胡适日记全编(1928-1930)》(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84页。
- ㉕严昌洪《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34页。
- ㉖杨天石《告诉你所不知道的蒋介石》(北大文史大讲坛的讲演,2010年10月29日),载《人民网文化频道》(<http://culture.people.com.cn/GB/70968/70970/13082388.html>)。
- ㉗见曹伯言《〈胡适全集·日记〉“整理说明”》,《胡适全集·日

- 记》第2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 ⑲详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66-1384页。
- ⑳《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76、477、480、482、488页。
- ㉑“蹲点”是刘少奇主导“四清”运动的方法之一,杨尚昆已意识到毛刘分歧“不只是方法问题”这么简单了。同上书,第489、492页。
- ㉒见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第165页。
- ㉓严昌洪《中国近代史史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
- ㉔黄淳浩《郭沫若书信集》(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75页。转引自严昌洪上引书,第124页。
- ㉕见张乐天在复旦大学“张乐天社会生活工作坊”会议上的PPT演示,2016年4月9日。
- ㉖施蛰存(1905-2003),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苏雪林(1897-1999),教育家、文学家,先后在沪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后到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任教。作品涵盖小说、散文、戏剧、文艺批评。
- ㉗辛夷《八卦不易》,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2月23日。
- ㉘郑芬《施蛰存与苏雪林见面例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3月2日。
- ㉙严昌洪《中国近代史史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8页。
- ㉚①张素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撰与价值》,载杨凤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6-87页。
- ㉛②《周恩来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703页。
- ㉜④转引自张素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撰与价值》,载杨凤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98-99、99页。
- ㉝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555页。
- ㉞2013年12月25日人民网党史频道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辑特点和出版意义”为题策划推出的编撰者与网友交流的节目中,年谱主编、原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说“这部书我们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有20位同志参加,是集体创作。”“十多年”上溯当不晚于2002年,其时张春桥、姚文元尚存人世。见人民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1225/c85037-23943073.html>)
- ㉟⑦《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2页。
- ㊱⑧《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81-1782页。
- ㊲⑨《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49页。
- ㊳⑩金大陆《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社会科学》(上海)2009年第8期。
- ㊴⑪辛逸在“比较与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研究前沿”研讨会上的点评(2013年12月18日下午),载耿化敏《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9-150页。
- ㊵⑫张素华《〈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撰与价值》,载杨凤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90-91页。
- ㊶⑬刘少奇说他到湖南农村搞调查,你不承认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家就不服。见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21页。
- ㊷⑭这里不提那种出于某种利益而公然改变档案原件、毁灭证据的做法,即使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档案意识的极度薄弱。如原公安部办公厅干部孙宇亭披露,“文革”期间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中办主任汪东兴因批准查阅原内务部部长曾山档案一事触怒中央某负责人,为免责竟当着原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档案馆军代表和他几个人的面,把他们在批件上的批示剪掉烧毁。孙宇亭《“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案的真相》,《人民公安》2001年第12期。这种事情做法匪夷所思,过程乖悖滑稽,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有党以来没有这么不严肃的。
- ㊸⑮关于1973年政治局批周会议,可参见陈兼论文《周恩来与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 ㊹⑯徐景贤《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297页。
- 作者简介:陈明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成婧)